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八七）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五三期 ——
(二〇〇七年二月五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0702a)

【回首文革】聂元梓文革回忆 (节选一)

聂元梓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回首文革】

聂元梓文革回忆 (节选一)

• 聂元梓 •

第九章 一夜之间名满天下

◇ 一走了之？

1966年的事情真是多。我被派到怀柔去搞农村的社教运动，还没有走人，因为生了病，在家里养病。也许是命运的捉弄，我成了轰动一时的大字报的领衔签名者。

这年的3、4月，曹轶欧以中央理论小组的名义，带着从北大哲学系刚刚调出去的张恩慈等几个人，到北京大学来了。当时，我不明白曹轶欧到北大来的意图。现在看起来，这是康生插手北大的险恶手段，他知道北大前一阶段的社教运动起伏很大，暴露出学校存在的严重矛盾，就像苍蝇一样，他要叮北大这个“有缝的鸡蛋”了。

曹轶欧等人住在北大的专家招待所，什么时候来的，准确时间不知道，但是，曹轶欧到北大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张恩慈是刚刚从北大哲学系调出去的，回到学校，他难免要看望同事，说明情况。此后，有一天，曹轶欧找我谈话。她动员我不要下乡去，要我留在学校里，继续与陆平他们斗争，她说，你们就这样算完了？让人家整了一通，放下去搞“四清”，说走就走，学校的事情不管了？

我呢，经过前一阵的事情，有些心灰意冷，张磐石他们进学校，也找我做过动员工作，动员我对学校和陆平的工作提意见以改进学校的工作。他们说都很好听，都很诚恳，为了改进北大的工作，不论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揭露校党委的矛盾。我满腔热情地向他们，向党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向中宣部副部长这样的大人物谈了我对学校党委和陆平工作上的看法，以为他们是上级领导，会协调好有关方面的矛盾，帮助陆平改进工作，结果却是发动了一场社教运动，矛盾激化，学校内部形成很尖锐的对立性的意见，我无端地惹了这么多的是非，受到这么大的挫折。这是我参加革命工作30年来，第一次卷入党内的斗争，就吃这么大的苦头，遭这么大的罪。我还能打得起精神来吗？中央书记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都在北大表演过了，我是指陆定一指示张磐石在北大搞社教运动，整陆平（毛主席曾经说过，“北大社教运动是姓陆的整姓陆的”。）邓小平对北大社教运动做了三条指示，要把社教运动继续搞下去。彭真却要煞住社教运动的车，调转了方向，顶住了中央和宣传部，决定召开国际饭店会议，整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这么多大人物都关注着北大，你康生再插手，未必就有多大的能耐。说起来，康生不过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而已，比起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来，职务都要低。我自己呢，在北大眼看着是难以呆下去了，陆平要把我发落到乡下，我又想着通过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给我调动工作，离开北大这块是非之地，一走了之。因此，我也不想多讲什么。我对曹轶欧说，北大的事情，谁也搞不了，上边的人发指示，翻过来翻过去，还不是我们这些小干部们倒霉？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了。北大的事情太复杂，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解决的。学校安排我下乡搞四清，我过几天就要到怀柔去了。我这样消极的态度，曹轶欧对我也没有办法。

◇ 晴天霹雳般的“5.16通知”

我已经到下放怀柔搞四清的地方去看了一趟，接上了关系。因为回来后感冒了，在家里休息几天。我决定要到农村去参加四清，正准备到怀柔去，中共中央关于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发表了。学校党委进行传达，我是北大校党委委员，先一步听到了有关的中央文件。

为了说明我当时的思想状况，让因为年代久远而逐渐忘却当时的社会氛围的人们，和后来的不熟悉那一段历史的年轻人们，理解我的心灵历程，我这里要较多地介绍和引用《5.16通知》的内容。

中共中央发出的这个《通知》批判矛头所针对的，首先是当时在党中央排在邓小平的位置之后的彭真。彭真当时在党内的地位非常重要，除了毛刘周朱陈林邓七个政治局常委，就要数彭真了。他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排名于邓小平之后的书记，受命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他一身而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是负责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真可以说是身负重任，以至在一段时间里，大家都认为彭真现在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了。“5.16通知”就是批判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起草的一份关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汇报提纲的。“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这个《通知》，把“汇报提纲”的问题说成“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然后，《通知》以针锋相对的方式，对“汇报提纲”中的提法做了严厉批驳，给“汇报提纲”足足列了10条罪状，并且总结说，“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

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如此严厉地而公开地揭露和批判彭真，足以让全党全国人民震惊。尽管说，在此之前，我已经从邓觉先那里，得知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彭真，但是，“通知”的这种严厉口吻，我仍然没有想到。但是，事情并没有到彭真为止。“通知”的意义，是通过彭真的事例，说明党内斗争的严峻和危险性，说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各部门都混进了许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向各级党委和各部门领导进行斗争，要去揪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通知》号召说，“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最后两段文字，是毛泽东亲自增写的，其分量之重，可想而知。尽管说，在传达这份《通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它是出自毛泽东之手，但是，这个文件的矛头所向，一是批判彭真和彭真主持起草的“汇报提纲”，并且把彭真斥责为是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二是指明类似于彭真的人物在党内大量地存在，必须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揭露和清洗，这却是毫无疑义的。

◇ 震惊与激动

“5.16通知”，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给听懵了。真是没有想到，建国以后这么多年，我们党内的政治状况竟然是如此地充满危机，还有人胆敢违抗毛主席的指示，胆敢打着红旗反红旗；而且，还组成了反党集团，有文有武，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推翻红色政权！

而且，进行这些反党反毛主席的活动的首领，竟然是近年来在政坛上深受重用而非常活跃的彭真！更加严重的是，各省、市、党政军各部门内都有一批这样的人物！

从“通知”的精神看，最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它通过批判彭真和“汇报提纲”，明确指出，不仅是北京市，而是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且已经混进了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新闻界、教育界等等，“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说明党当时正处于多么危险的状态，党内的敌人猖狂到了何等的地步！

我是既震惊，又激动。我参加革命近30年了，虽然说，在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接受过党内斗争的洗礼，但是，当年在延安，一来是我始终处于运动的边缘，二来年龄又小，对那一场斗争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教训。对于党内斗争，我是谈不上什么经验的。我投身革命以后的绝大部分时间，经受过战火硝烟的考验，但是，在党内，我都是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兢兢

业地地为革命工作的。无论如何我都没有想到，党内会出这样大的事情！

中央文件的精神，要揪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艺战线、教育战线、新闻出版部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号召和发动每一个党员起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黑线开火，这又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在战争年代，我虽然年纪小，但是革命意志很坚决，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情况多么危险，都毫不动摇，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又发出了战斗号令，我同样不能落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一定要坚决紧跟，积极参加，把党内的敌人统统揪出来，统统打倒，以便让我们出生入死地打下的红色江山永远不改变颜色！

我想，中央文件所讲的，要批判和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不是和前些时候北大搞社教的目标相一致，矛头是对准陆平这样的负责干部吗？而且，“5.16通知”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比北京市委当然要站得高看得远了。何况，彭真在这次会议上是受批判的，是这次会议揪出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第一号人物，那他对北大的态度，他所支持的陆平，肯定也是错误的了。《通知》批判彭真“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他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是包庇了邓拓、吴晗，在此前的社教运动中就是包庇陆平，这是顺理成章的，合乎逻辑的。至于北大，在传达中央的这一系列重要文件以后，并没有再作出什么具体而深入的行动去批判彭真、批判“三家村”，这又可以成为他们作为彭真等人的紧密追随者的确凿证明。

我以为，党中央毛主席发出“5.16通知”，就是号召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起来保卫党，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我到北大工作以来，一直是非常注意党中央的文件精神和毛主席的指示的。在哈尔滨，因为受到家庭中与吴宏毅的关系不好的影响，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心中存有愧疚。到北大工作，没有家庭问题拖累，我应该努力地跟着党中央毛主席，把工作做好。这也是我唯一的精神安慰。因此，听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关文件，我有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翻来覆去地思考北大的情况，思考北大与北京市委、与彭真的关系问题，思考我在北大的亲身感受与党内斗争的关系。

我想，我要听党中央的话，跟党中央走，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彭真的垮台，让我看到了把北大的问题澄清的希望，看到了把国际饭店会议上给校党委和陆平提意见的积极分子挨整所受到的冤屈澄清的希望。我非常希望，能够在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后，有一个讨论和分清是非、改进工作的阶段。我那时候就想，北大前一段的问题太复杂，上面插手的人太多，是要中央最高领导人出面才能解决了的。我想，那就再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个报告，汇报一下北大的情况吧。这是符合当前的文件精神的嘛。我当时对于什么是走资派，什么是修正主义，并没有搞清楚说实在的，不要说我，全党全国，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就是毛主席党中央也没有对什么是“走资派”、什么是修正主义下几条定义就是凭着一些感觉，以为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以及照陆平这样发展下去要变修，就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变成走资派，全党全国就会变色。现在，中央下了决心，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反修防修，并且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我当然要积极响应了。

◇ 友谊宾馆里的面谈

这样，我找了哲学系的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让他找了哲学系的老师宋一秀、杨克明、夏剑彖，还有高云鹏，讨论写报告的事。

自从国际饭店会议以后，给陆平提过意见的人，都闹得元气大伤，一些人要调走，我都是不加阻拦，给他们开绿灯。何止他们，我自己都想调走，想让安子文给我换一个单位。杨克明动作快，这时已经调动工作到中国科学院去了，不过还住在北大的22楼。张恩慈也是闹着调走了，到了中央理论小组，现在又跟着曹轶欧杀回北大了。

我找了赵正义和杨克明商量，本来是要找他们也写一份报告给毛主席刘主席，反映北大的情况。写信的人多了，反映情况的人多了，毛主席他们总该听一听吧。杨克明说，写什么报告，就写一张大字报吧。我也表示赞成。因为在这以前，我在国际饭店受批判时，我已经给毛主席刘主席写过报告，反映北大的情况，还是请田家英同志亲自转交的，结果是没有任何回音。我给北京市委和彭真写的信，也如石沉大海。写大字报，不仅是能让广大群众知道，也准能反映到上级领导那里去，这可能比给党中央毛主席刘主席写信还要管用。

我们要写大字报，因为是党员，又是给自己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写大字报，我们就想到要请示有关领导。该请示谁呢？请示北大党委，陆平就是党委书记，我们绝对不能去找他，找他他也不会同意。请示北京市委，彭真已经倒台了，李雪峰是新的市委书记，可他还是华北局第一书记，他的办公地点在哪里，在华北局还是在北京市委，我也搞不清楚，到哪里去找他呢。杨克明说，那就找一下张恩慈，通过他问问曹轶欧吧，他们是党中央重新设立的文化革命小组派来北大蹲点的。你给张恩慈打个电话不就可以了吗？

然后，我给张恩慈打了电话，说明我们想给陆平写张大字报，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曹轶欧。这样，张恩慈对曹轶欧讲了，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曹轶欧就通过张恩慈通知说，接见我和杨克明，就在现在四通桥西北角，原先的友谊商场的二楼。当时那是友谊宾馆的客房。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当时要准备成立一个马列主义研究院（后来，可能因为进行“文革”运动，没有搞起来），张恩慈从北大调出，也是到那个研究院去。曹轶欧大概是参加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筹备工作，那时候就在这座楼上办公。她到北大搞调查研究，这里离北大也近一些。她在北大的专家招待所和友谊宾馆两处都有办公的地方。

我和杨克明按时到达友谊宾馆，曹轶欧把我们叫到正好是一个拐角的房间去，这是一个会客的地方。参加的人有曹轶欧的秘书和张恩慈。曹轶欧问我们找她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汇报说，听了“5.16通知”，领会“通知”的精神，我们对北大校党委和陆平的工作有一些意见，我们想给陆平写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面。因为陆平是北大的党委书记兼校长，这样做，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领导。曹轶欧说行，贴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呢？她并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因为她在北大蹲点已经有些日子（前面讲过，她在该年春天就到北大来搞调查，只是在“5.16通知”发表以后，又改换成中央文革派来搞调查的名目了），北大的情况，以及给陆平提意见的情况，她已经掌握了，还有调查小组里的张恩慈，本来就是北大哲学系的人，自然会向她提供基本情况。所以，曹轶欧也没有问我们要写什么内容，就说，“5.16通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就是要发动群众，大字报可以写。我们是从组织原则问题请示她，可以不可以写大字报，不涉及具体的内容。大字报写什么，事先没有想好，也没有对曹轶欧讲要写什么内容，反正是对着校党委和陆平工作问题的，具体内容呢，是在得到批准以后，我们几个人再回来讨论的。

◇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问世

这样，我就和赵正义、杨克明、宋一秀、高云鹏等人说明，已经请示了领导（曹轶欧），同意我们给陆平写大字报。他们听了传达精神，大家都很高兴，从组织原则上说，大家都放心了。这样，我们开始在杨克明家里讨论起草大字报。为什么选在杨克明家里呢？因为杨克明已经调离北大了，在杨克明这里做什么，北大党委管不着。这期间，在下面参加“四清”工作组的夏

剑彖回来了，也参加了大字报的写作，但没有多谈什么。大字报的第一稿是宋一秀写的，然后几个人一起讨论，宋一秀改了第二稿。这已经是5月24日晚上，几个人一看，还是不行，杨克明就说，“还是我来执笔吧。这天晚上就不再讨论了。我开个夜车，明天早上，我上班时把修改稿留在家里，你们来取底稿就行了。”杨克明很有把握，成竹在胸，我们就同意了。第二天，5月25日，宋一秀从杨克明家取了大字报的底稿，和高云鹏一起，在24楼教师宿舍，开始用毛笔抄写，我去看了一下，前半部分可以，后边加了一段话，加了三个口号，就这样定了稿。宋一秀抄写大字报的时候，我又到了就住在24楼同一座楼下的李醒尘那里，对他讲了大字报的内容，问他愿意不愿意参加在大字报上签名。李醒尘很高兴，到楼上看了大字报的内容，一口答应了，当即签了名。

抄完了大字报，我就带头签了名。宋一秀、夏剑彖、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人都签了名。杨克明是别人代签的，是宋一秀还是高云鹏代的，我记不清了。这是吃中午饭以前的事情。在午休以后，我们就把大字报贴出去，贴在大饭厅的东山墙上。正好学生睡午觉起来到教室到图书馆去，都从那里经过，一下子就在全校引起了轩然大波。

◇ “是战斗的时候了！”

我们七人大字报的全文如下：

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做，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做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哪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

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做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 宋一秀 夏剑矛 杨克明
赵正义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 关于大字报的辩白

我再强调一下，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就是我们几个参加写作和签名的人知道，我们事先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曹轶欧不知道，康生也不知道。我们向曹轶欧请示，只是从组织原则出发，请示大字报能不能写，能不能在校园内贴，没有讲具体内容。写什么，怎么写，我们都是一边起草一边商量的，而不是带着写好的底稿去见曹轶欧，更不是受到曹轶欧的指使和授意才写这张大字报的。在近些年的报刊上，这种不负责任的捏造太多了，但是，因为我的处境问题，我却无法为自己进行公开的辩护，任由别人把一盆盆的污水都往我身上泼，把各种捕风捉影或是以讹传讹的说法、捏造出来的谎言和罪名强加在我的身上。

我们的大字报的精神是什么呢？只要是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就可以断定，我们的大字报所遵循的，完全是中共中央“5.16通知”的基本精神，是对于中央文件的一次“活学活用”：

“5.16通知”批判彭真阻碍对于吴晗和“三家村”的清算，我们的大字报批判的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北大校内阻碍对于“三家村”的真正揭露和批判；

“5.16通知”列举了彭真关于进行文化批判的种种言论，指责彭真混淆了文化革命的性质，缩小了这场斗争的意义和规模，我们的大字报批判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关于进行文化批判的有关指示，同样是指责他们把文化革命运动引导到他们指定的轨道上去；这不是推卸责任，不是生拉硬拽，而是不争的事实。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党内高层就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为了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而激烈交锋。因为这场斗争，是从北京市的有关领导发端的受到批判的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邓拓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三家村”的另一位成员廖沫沙是北京市统战部长，站在第一线力图引导和控制这场大批判风暴的彭真，既是中央书记处列于邓小平总书记之后的书记，是成立不久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组长，时又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前面说过，“5.16通知”对彭真的批判和清算令人震惊，“5.16通知”批判的就是彭真所要求的“纯理论”“纯学术”批判和“坚持讲道理”、“加强领导”等防止大批判运动失控的提法和做法；而且，“通知”对于当前运动的定性，完全是以毛泽东的口径为依据，就是要发动群众，搞大民主大字报大批判，向所谓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开火，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大字报，完全是在毛泽东所主持制定的“5.16通知”的精神范围之内，并没有什么自己的发明。大字报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当年在报纸电台和中央文件中所习惯地使用的一些用语和概念，是特定时代的火药味十足的、杀气腾腾的语言。属于我们自己的内容，就是结合了北大的实际，把陆平、彭佩云和他们的上级宋硕关于如何领导运动、控制局面的言论进行了揭露和批驳。今天回想起来，这张大字报完全是错误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展起了很坏的作用的，尤其是给陆平、彭佩云和宋硕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愿意表达我的深刻反省和歉意。但是，这张大字报的方向问题，不能完全由我们几个人来承担，它是遵照党中央“5.16通知”的精神而写出来的。

这张大字报，也不是针对彭真的。尽管说，彭真对于北大的社教运动做过指示，扭转了局面，使我们受到压制和批判，但是，我们对彭真并没有个人的恩怨。“5.16通知”对于彭真问题的阐述，触目惊心，但是，我们领会中央文件，是要掀起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而不是继续清算彭真。彭真已经是“死老虎”了。要向彭真和北京市委发难，我们何必要从宋硕入手？宋硕当时的职务，是北京市委大学部的副部长，并不是市委的要害人物，更不是攻击彭真的关键所在。我们完全是就事论事，就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势，而牵涉到宋硕的有关言论。对于陆平，是这张大字报的锋芒所向，我认为，他对于文化革命的压制，和他对于社教运动的压制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要想把他的问题揭示出来，当然是从当下的学校情况入手比较方便，而且，我们还有“5.16通知”这样的中央文件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所以，就很有“理直气壮”之感了。

其实，关于这张大字报，它问世不久以后就产生出种种流言和对我的非难了。当大字报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以后，有人就指责我发起写这张大字报是“进行政治投机”。这真是无稽之谈。我提议写它的时候，许多事情都是无法预料的，谁能料想得到，它会直接送到毛主席那里，得到毛主席那么高的评价，会把它提拔到那样的政治高度？“投机”说，是事后诸葛亮的伎俩，要是不“投机”，在当时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应该怎么做？前面所讲的，关于我对陆平看法的改变，和我在北大的经历，使得我出面批判陆平等，是合乎逻辑的，是顺理成章的。尽管说，这件事是大错特错，造成那样恶劣的后果，我对此非常痛悔，但是，它却与“投机”无

缘。我犯的是政治错误，是在当时从党中央主席到普通民众中弥漫的极左思潮的驱使下，做出了损害党和民族利益的错事。所谓“投机”，则是涉及到对我政治品德和人格的评价。

◇ 一石激起千层浪

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去，引起很大的反响，一石激起千层浪。事情非常巧合，当年反右派运动的前期，大鸣大放的时候，谭天荣（1957年因为参加“鸣放”发表个人言论被打成右派的北大学生）的大字报也是贴在这里的。历史的巧合，让人产生联想，看着我们的大字报，有人说，谭天荣又出现了；有人说，这是反革命大字报，是反党；当然也有赞成我们的大字报而反对这些意见的，自然地形成了辩论的场面。学生们本来是下午要去上课的，这样一来，教室也不去了，就在大饭厅外面，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争论得热火朝天，而且像滚雪球一样地，越滚越大，人越来越多。高云鹏还受到了他人的围攻和推打。

在贴这张大字报以前，我在哲学系的一部分教师、干部和学生当中也讲了，根据中央的“5.16通知”精神，可以对校、系工作和陆平校长等领导写大字报。当时系里也有不少人写了大字报，和我们这张大字报几乎是同时露面，都贴在大饭厅外面的墙上，几面墙都贴满了，非常有声势。这些大字报，都是给校党委提意见，讲工作上的问题的，没有什么恶言恶语，没有人身攻击。

一个下午，大字报前面都是人声鼎沸，群情振奋。晚饭以后，我们哲学系召集全体师生开大会，就是号召大家给校党委提意见，同时，对我们的大字报有什么看法，也可以提出来。这时候，有对我们的大字报持反对意见的人，到哲学系的会场上来，要找我辩论，哲学系的人则反对他们干扰我们开会，为此引起争执。那时候争得很激烈，可是没有多少个人的因素，全是从对于中央精神的理解和对于学校党委的评价角度相持不下的。

晚上，杨克明回到学校，看到了大字报贴出后的情况，他又害怕又着急，他的态度改变了。他责问我们，是谁把他的名字签在大字报上了？我们说，你走以前不是交代了，要我们替你签名吗？杨克明是看到全校师生围绕着我们的大字报辩论得很激烈，群众的情绪都沸腾起来了，有些害怕。他指责说，“光是同意我们写大字报，她知道不知道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是想指责曹轶欧，又不敢明说。他要我立刻把张恩慈找来。杨克明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上一次社教工作队在北大，就是动员我们这些普通干部和教师给陆平、给校党委提意见，把人都发动起来了，结果呢，工作队说撤就撤，留下我们这些积极响应工作队号召的人挨整。

为了安定人心，我就说，那我们先找张恩慈问一下情况吧，让他问问中央文革，看他们有什么说法。当时我的心里比较镇静，因为大字报内容是根据党中央“5.16通知”精神写的，我仔细考虑，内容没有违背“通知”的精神，相反地，它是积极地响应“5.16通知”的精神，是遵照“5.16通知”写出来的。眼下只是对党中央关于我们大字报的具体意见不清楚。我就打电话给张恩慈，说我们的大字报贴出来了，学校里乱了，群众对大字报有争论，对这个局面应当怎么对待？中央文革小组会有什么态度，中央会有什么态度，请他帮助我们请示请示。张恩慈在电话上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说不要着急，请示以后再说。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张恩慈来到北大22楼杨克明家里，我们都在这里守候。张恩慈见到我们后没有多讲什么，他只说领导要我们把大字报抄一份给他，送给中央文革和党中央看看。张恩慈来了以后，杨克明又对他发火了，他说，你们现在怎么都不吭声？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会怎么样？张恩慈说，我把大字报带回去，先给中央文革的领导看一看。你们等着我的电话吧。当天晚上，我们等了很久，张恩慈的电话一直没有来。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是没有什么底。但使我镇静的是，第一，大字报内容是根据中央精神写的，是响应党的号召的；第二，从组织原则上说，我们请示了上级领导。我仔细思考，我是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不

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公心，所以我很镇静。其他参加写大字报的几位同志也是如此，我们不怀疑自己的大字报出错，主要是对大字报引发的这种混乱局面觉得不应该，需要及时解决。越是没有回音，大家就越是紧张。

我们的大字报贴出来以后，在北大引起了轩然大波。围绕对于学校工作和陆平等人的评价问题，很快就形成了反对陆平和拥护陆平的两种意见。当时对大字报的争论，主要还是认为给党委领导领导人贴大字报就是反党，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这种观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很普遍的。“5.16通知”的精神，还没有在群众当中普遍传达，只是在一部分党员干部和教师中传达了；而且，即使是听到中央最新文件的人，领会“5.16通知”也有个接受和思考的过程。因此，对大字报的争论，双方都是理直气壮，互不相让。陆平他们也不敢怠慢，连夜召开会议，商量对策。我们的大字报是5月25日中午贴出来的，当天晚上，陆平就召开党委常委会讨论怎么办。并组织了反击的大字报，同样贴在校园内和大饭厅墙上。

◇ 惊动了最高领导层

5月25日晚上，陆平他们正在开会，华北局第一书记、新上任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来了。这时候已经是半夜了。李雪峰是和华北局的另一位书记池必卿一块儿来的。李雪峰一来，就召开全校群众大会，地点是在办公楼礼堂。校内各单位都有有线广播，组织收听。大会刚刚开始，我正在听着李雪峰讲话，池必卿把我叫出来了，由副校长戈华陪同他一起找我。他把我叫到楼上，对我说，“你是一个老同志，你写这张大字报，怎么都不请示领导呢？”他显然是憋着一肚子的气，还在尽量地控制着。

“我请示了。”我说。

“你向谁请示了？”池必卿问。

“我请示中央文革，请示曹轶欧了。”我就把我向曹轶欧请示是否可以给陆平写大字报一事的情况对池必卿讲了。

这样，池必卿就不说话了。因为这时候，“5.16通知”刚刚通过，中央文革刚刚成立，就是专门领导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我不请示他们还能请示谁？我就是想请示北京市委，北京市委也是刚垮台，找不着人呀！李雪峰刚刚到北京，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那天晚上，李雪峰的讲话我没有听全，他的意思就是不应该写这张大字报。但是口气并不是很坚决。大会刚要结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张彦也到北大来了。张彦说他是总理派来的，他传达总理的意见说，贴大字报可以，但是不要贴在外边，应该开辟一个室内的场地，用来贴大字报。因为刚刚过完“五一”劳动节，一些外宾还没有离开北京，让他们看到大字报，影响不好。

到第二天，陆平就组织各个系开会，谁表示赞同这张大字报了，都要检讨。学校同时开辟了一个饭厅专门贴大字报，要求不许把大字报贴到屋外墙上。同时，北大的副校长黄一然，把我找到未名湖附近的临湖轩里一间办公室去，要求我检讨，并且要求我把七人大字报撕下来。我说，我贴大字报是经过认真思考，是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既然贴了我就不能撕下来。我贴大字报是提意见，没有错。我不能做检讨。你要是说贴的地方不对，以后写大字报我可以贴到屋里去。

后来，我们又新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到了38楼下坡、靠燕南园的那个饭厅里。这一张大字报，是回答别人的批评，进一步地阐述我们的观点。很快地，那个饭厅里就贴满了大字报了。陆平组织了学生，反驳我们的七人大字报，也有人支持我们，大字报太多了，饭厅太小，很快

就贴不下了。结果是又把大字报贴到外面了。这种形势持续了4、5天。

◇ “红色电波传喜讯”

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我们的七人大字报。用当时所使用的语言来说，就是“红色电波传喜讯”，毛主席党中央支持了我们的革命行动。对此事的重新评价和思考，则是后来的事情了。

这时候，我不在学校。我母亲患了病，开刀做大手术，住在协和医院，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轮流到医院去看护她。这天轮到我在医院陪床，到傍晚的时候，我哥哥去接替我。我从协和医院出来，回学校去休息。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忽然听到街头的大喇叭响了，在“嘟嘟”地报过晚上8时以后，一个宏亮的男声响了起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时间……下面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个同志写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播音员慷慨激昂的声调，更显示出我们的大字报的气势。我不由地驻足倾听。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这可真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我们写这张大字报，是为了表示我们坚决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对陆平等人未能积极领导北大对“三家村”的批判进行揭发；让我任意地发挥想象，也不过是这张大字报能够被中央领导认可，对北大校内工作上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能有一个认真的清理，来一个革命化的改变，根本没有想到中央会作出这样惊人的决定，把它向全国广播，并且成为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的重大新闻，进而传到世界各国的新闻界和政界。

而且，更令我震惊的事情还在后面呢！正像那句歇后语所说，“老鼠拉木锨，大的在后头”。我们的大字报，列举了陆平所传达的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对当前运动的指示，和陆平、彭佩云在北大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有关言论，即他们想把这场运动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里，不要失去控制和秩序；我们把他们三个人对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当作是压制北大革命群众投身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这些言论进行了反驳。不过，我们的大字报并没有对他们进行什么定性，没有给他们扣什么大得吓人的帽子。我们没有这种水平，也没有这种想法，仅仅是以普通干部和教师的身份公开出面批评学校领导，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哪里会想到其他。但是，紧跟着广播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那就大不一样了。其火力之猛烈，上纲上线之高，当时的确是震聋发聩的：

“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陆平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身份，以‘组织’的名义，对起来革命的学生和干部，进行威吓，说什么不听从他们这一小撮人的指挥就是违犯纪律，就是反党。这是‘三家村’黑帮反党分子们惯用的伎俩。请问陆平，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你们的纪律是什么纪律？事实使我们不能不作出这样的回答，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时至今日，看得很清楚，这篇评论员文章，是利用了我们的大字报的错误，借题发挥，变本加厉，为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吹起了动员号。它毫不含糊地指斥陆平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是“反党集团”，并且把北大党委诬陷为“三家村”的一个分店，诬陷宋硕、陆平、彭佩云是“‘三家村’黑帮分子”，并且号召人们去摧毁仍然存在的别的什么“三家村”、“四家村”，把“将帅”和“车马”一起揪出来，从而掀起了反对各级党委的狂潮，并且确认了各地都有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存在。这样的文章，在国家的广播电台上向全国全世界公开宣布，并且还登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自然是代表党中央的声音，进一步动员民众投身于文化大革命。

白天里总是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上，这时人已经不多了，但一簇簇的人们，都和我一样地停下脚步，认真地听着电台广播。我们的大字报，得到党中央的支持了！几天来围绕着这张大字报的是是非非带给我心头的压力，一扫而光。而且，党中央对我们的大字报，评价是那样高，毫不含糊地为我们撑腰，支持我们对陆平等人的批判，我听了自然是非常兴奋。但是，为什么党中央给了我们大字报那么高的评价，我还没有十分理解。正是华灯齐放的时候，我的眼前一片光明！

我就这样心情激动地赶回学校。宋一秀他们正在到处找我。我们都激动万分。学校里的大喇叭在反复地播送着我们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这一下子，学校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了，我们的毛主席下决心解决党内的问题了。

从这一刻开始，北大的校园就沸腾起来了。当初支持我们批判陆平和校党委的，自然是兴高采烈，加大了火力继续向北京大学的“三家村”分店和陆平等猛烈开火；曾经是处于观望态度的人，也无法保持沉默，纷纷地贴出响应党中央号召、批判学校领导和各系领导的大字报；那些曾经表态拥护陆平的师生，也不得不掉转矛头，反戈一击。我们几个带头写大字报的人，一下子变成了知名人物，成了方方面面关注的重点。还有，北京的各高校，都纷纷来人到大北“取经”，学习北大批判校党委的“经验”。一时间，校园里到处都是揭发批判北大校党委和陆平书记的大字报大标语，到处都是本校和外校师生活跃的身影。而且，不仅是本市的各高校，北京各工厂的群众，甚至一些外地的高校学生和工厂的工人，也赶到北大来看大字报，学习北大开展运动的经验，一时间，学校里熙熙攘攘，人来车往，热闹极了，每天来学校看大字报的人都是成千上万，而且都表示要向我们学习取经。那时候，我哪里想得到，这是一场民族大灾难的开端呢！

第十章 从工作组到校文革

◇ 工作组进校和“6.18事件”

我们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在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以后，由华北局派出的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马上就进校了。

在此前后，陆平的日子就很难过了。他自己受到批判，他住的院子也不安宁，有学生往里扔砖头，还有人扒墙头，等等。工作组呢，他们先是叫陆平劳动。这也是当时的一种习惯做法，下台了，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做，那就先参加体力劳动，听候上级的处理。参加体力劳动，就是表示犯错误了，要在劳动中改造思想。陆平就在校园里劳动，拔草，结果呢，他一出来，一些好奇的学生和职工，就去围观，还有人辱骂他，这样造成的影响很不好。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觉得虽然陆平犯了错误，但是在公开场合出现这种现象也是不应当的。我就给工作组提意见，不要让陆平在校园里进行拔草劳动。后来呢，工作组就把陆平关起来，不让他露面了。

与此同时，各个系里也闹起来了。在批判校党委的同时，各个系的学生和老师，就追着系里的系主任或者是党总支书记，向他们发难，要他们回答问题，搞得他们很狼狈。我就在二院外边的树林下面看到一些系的学生追着他们的党总支书记进行批斗，群起而攻之，要他们交代问题。

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是个老同志。他是和李雪峰一起调到北京市委，当第二书记的，在当时就觉得他们取代彭真、刘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本来学生们是很拥护他的，因为他是被新北京市委派来领导运动的。可是，他有些方面做得不好。张承先住在临湖轩。他从临湖轩上办公楼开会，不过是100多米，他都要坐汽车去，官气十足，比陆平的派头还大得多。这是一点。另外，工作组接管了学校的大权以后，他们也需要控制学校的局面，把学校的批判斗争控制在他们设想的范围内，要求学生听从他们的安排和指挥，这样，学校师生就感到又是受到新的限制以至压制了。这样就给学生的印象很不好，觉得又来了一个官老爷，还是限制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张承先的一些做法，让学生们想到刚刚倒台的陆平。既然陆平因为阻碍运动被赶下台了，学生们对张承先的举动由怀疑到反对，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随后，就发生了“6.18事件”，就是校园里一批学生冲破工作组划定的界限，自发地起来批斗所谓“牛鬼蛇神”，于6月18日出现了乱批乱斗的混乱局面，然后，工作组出面，把“6.18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在校园里对参加了当天的批斗活动的学生和职工进行清查和批判。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在现场。那一天我是在系办公室，没有到外面来。就是这样，工作组不知道怎么会怀疑到我头上，以为我是“6.18事件”的后台，以为我是幕后指挥者。我告诉工作组，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我是不知道的。好在后来工作组追查这一事件的时候，的确没有发现我与此事有什么联系，这才作罢。

这一段时间，我没有什么行动，我处在这个位置上，被毛主席肯定了，和以前的处境不一样了；不过，我感到非常困惑，我不知道运动应该怎么进行下去，但是，我对这类造成混乱的事情都是尽量躲开的。在我内心里，我是反对这么搞的。我也不到场。当天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清楚，但是，张承先把它定成“6.18反革命事件”，肯定是错误的。参加“6.18”事件的学生和职工们的自发行动肯定是偏激、过火的，但是，为此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准备进行严厉的处理，那就更是以错对错了。

后来公布的材料说，我曾经被任命为张承先工作组的办公室主任，但是，我自己并不知晓此事，没有人通知过我就任，我也没有参与过工作组的工作，更不知道我这“主任”的“办公室”在哪里。

实际上，当时我的态度是反对工作组的。学生们有什么错误，就说什么错误，不应该定成什么“反革命事件”，这帽子对于学生来说太重了。

但是，我也保护工作组。工作组挨批以后，学生要批斗张承先，我阻止过。张承先离开北大，是我安排的。那时候学生们是不肯放张承先走的，要让他在学校里接受批斗，要和他算“6.18事件”的账。而且，揪斗工作组，是当时非常普遍的现象，清华大学揪住王光美不放，就是因为王光美曾经在清华工作组充当过重要角色。当时给工作组定的罪名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等等。在我负责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筹委会的工作后，在对待工作组的态度上，我讲张承先和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学生乱戴帽子，压制学生，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这对当时群众反对工作组的行动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我的讲话是错误的），但不是敌我矛盾，不能像对待敌人那样对待工作组，我们和工作组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提法，我请示过康生，康生也肯定说工作组是人民

内部矛盾。因此，我们没有揪住工作组不放，让张承先离开学校，不要继续批斗下去。他走了就没事了，工作组撤离以后，北大没有像别的学校那样，揪住工作组不放，我们没有到北京市委去揪他。

而且，和别的学校不一样，当工作组走的时候，我要求，把工作组里的海军同志留下来。（进驻北大的工作组组长是张承先，副组长有海军航空兵部队政委彭林、北京军区政治部负责人郑希文等，工作组成员中也有一批部队干部。）为什么要留下军队的同志？那时候，学校没有了党的领导，也没有行政管理，校党委垮了，工作组走了，学校总要有人管啊。不管运动怎么搞，学校的正常秩序，学校的工作，学校的治安，都要维持，都要有人领导。一天也不能失去控制。我们和部队的关系特别好，直到成立校文革，我都坚持要有海军的同志参加。海军的同志为北大做了许多好事，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海军的同志是到很晚的时候才离开北大的。

我自己呢，自从那张大字报在全国公开发表以后，就陷入了一种非常被动的境地。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在《人民日报》和全国的报纸上刊登，得到那么高的评价，我心里的高兴，是真的。可是，外校来的学生，部队来的同志，到北大来，都要求见我，使我非常为难。我有什么了不起，我做了什么大事啦？运动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我们就是跟着走了一步嘛。我出来见人家，我说什么，怎么说？直到我当了北大校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我都是心中无数。对于运动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发展，应该怎么搞，我也是搞不清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怎么行？到了1966年秋天，我认为群众给领导贴大字报已经贴得比较充分，意见提得差不多了。我想，毛主席应该指示，运动搞得差不多了，贴大字报的高潮已经过了，大家都冷静下来，看看各单位都贴了多少大字报，给领导提了多少条意见，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都要一条一条地整理出来，具体地进行讨论，进行解决落实。真的，我一直是这么想，一直想等到毛主席发表这样的指示，没准哪一天毛主席就说话了，运动就平静下来了。可是没有想到，运动会越搞越大，越搞越乱，越来越难以理解。

◇ 江青在北大的拙劣表演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对江青产生了怀疑。这怀疑首先还不是政治上的，而是人品上的。

为什么会对江青产生怀疑呢？1966年的7月下旬，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几次来北大来，看大字报，召开座谈会，并且于7月25日和26日连续两天晚上召开全校万人“辩论”大会，辩论工作组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应该不应该撤离。江青和陈伯达都在辩论会上讲话。陈伯达一口福建方言，他说话人们都听不懂，他请王力给他当翻译，讲了撤工作组的问题，讲了为“6.18反革命事件”翻案的问题。江青也在大会上讲话，她的讲话让我非常反感！

这么严肃的大会，全北大上万人参加，江青又是那样的身份，毛主席的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运动怎么搞，你倒是讲出些水平来啊！没有想到，她在会上婆婆妈妈，讲了很多她的家务事，讲她的儿媳妇张少华（韶华）怎么怎么不好，还讲到她的亲家、张少华的母亲怎么怎么样，你讲这些干什么！我本来对江青的印象就不好。当年在前方，听说延安毛主席和一个电影演员结婚，大家心里就嘀嘀咕咕的，党组织专门发了通知，不许议论这件事，这才把大家的嘴给堵上了。在延安，我又听说江青对警卫员，对“小鬼”都那么不好，颐指气使，随意斥责，对她就更不“感冒”了。在北大听她胡扯乱七八糟的家务事，我就想，有多少重要的事情你不讲，关于运动怎么发展，你也不讲，你到北大是干什么来了？！这样，首先是从情绪上，对江青就看不上。

本来，在我们的大字报出来以后，张少华和她的妹妹，姐妹俩来看过我，她们都是北大的

学生，我们谈过话。我也看了她们带来的毛主席和她们姐妹俩的许多照片。我就是觉得张少华是毛主席的儿媳妇，她们姐妹俩还是北大的学生，感情上对她们是比较亲近的。江青再怎么讲，我对她们的看法也没有什么改变。可是，江青在会上讲她们的坏话，对于年轻幼稚的学生是很有影响力的，学生们以为张少华姐妹俩真是坏人，要揪她们俩，江青在大会上讲话后，大会还没有结束，学生们就开始要揪张少华和她的妹妹了。她们还以为是我指使的。她们两个就逃跑了。江青当时正在红红火火，当上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她点名批判，谁当得起？江青讲完话，张少华姐妹两个，就从北大跑掉了。跑就跑吧。我没有叫学生去抓她们。没有必要去抓她们。江青说她们是坏人，再怎么坏，也就是两个学生，还能坏到哪里去？江青怎么说，那是她的事，再怎么闹，是她们的家务事，没什么意思。我们不去管它。

后来，大约是在当年秋冬的时候，她们在逃亡中，写了一个条子给我，是叫她们的同学转交给我的，内容是说想回学校，是否可以？同时说她们跑到外边，生活很困难，处境很困难，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当时我不同意她们回学校。北大的中央干部子弟那么多，运动开始以后，他们的父母被批斗，他们自己在群众中就受到歧视，陆续地成为学校的纠纷人物。当时在校的高级干部子弟我都想让他们离开才好呢，免得出什么问题，她们现在回来干什么？生活困难，我可以积极想办法。可是，我无法同她们取得联系。给她们送条子的两个学生，急匆匆地把那个条子塞给我就走开了。她们的条子上这样说，她们躲在一个什么地方，给她们的回信可以塞到她们躲的那个地方的门下面。可是，送信的人已经走掉，没有办法找她们联系了。

但是，我还是想要帮助她们。我找不到她们，无法直接资助她们，我就把这件事和谢富治讲了，要求谢富治想办法帮助她们解决生活问题。谢富治是公安部长，他要是想找到张少华姐妹，应该是很容易的。可是，谢富治不理睬这个事，他说他管不了，让我找周总理。我说，我要见总理，得有机会，有场合，不能及时地解决她们的困难。谢富治就说，那么你给总理写个信吧，我转交给他。我当即就给周总理写了个便信，请谢富治转交给周总理。我推测，这样的事情，无论怎么说，谢富治不会从中做梗，张少华毕竟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汇报一下她们的近况，转达她们要求帮助的请求，这样的信息是应该能够传到周总理那里的。下文如何，我就不知道了。我写的材料是否有助于给张少华姐妹俩提供必要的帮助，我不敢肯定。至少，我是为此事尽了自己的力的。可是，等文革结束以后，张少华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字，一方面是说周恩来总理曾经在危难中帮助了张少华姐妹，一方面却说是我让学生去抓韶华姐妹俩，这绝对是错误的。我为什么要抓她们呢？从我的心情上讲，我是想帮助她们的，只是我当时没有那么大能力，否则我为什么要对谢富治讲，还给周总理写报告？张少华指责我，我可以理解，她不知道内情，不知道我给总理写过报告。这其中可能是误传，但也可能是有人成心败坏我，我早就成了众矢之的了。

◇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

1966年的8月份，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指示要北大的革命师生列席会议，我和杨克明、张恩慈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接见了我们三个人。康生、曹轶欧参加了接见。毛主席问我是哪里人，问了我的经历什么的，他表扬我们的大字报写得很好。毛主席还指示说，北大应该成立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的组织，要我负责成立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会的工作。

在十一中全会上，8月5日，毛主席突然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完全公开的姿态，在一个新的高度上，评价了我们的大字报，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并且将其作为向刘少奇开火的一颗炮弹：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主席公开讲明了党内有两个司令部，而且要带头炮打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到底刘少奇都搞了些什么，我也不清楚，不知道。光知道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那我们就得打倒刘少奇了。我不知道刘少奇到底有什么问题，应不应该打倒，可是毛主席这张大字报一公布，我虽然不知道刘少奇有什么问题，我们的大字报也已经成为打倒刘少奇的炮弹了。后来给刘少奇扣的那几顶帽子，我是感到非常困惑的：要说相信吧，这么严重的问题，隐瞒了这么多年，到底是什么人给他作掩护？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毛主席过去就一点儿都不知道？要说不相信，这都是毛主席亲自给他定的案，毛主席是不会看错人的。想来想去，还是要相信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给他做了结论嘛。不过，对于刘少奇，我一直没有多讲过什么，就是按照党中央的口径，重复中央文件和报纸上的提法，没有做过任何超出中央文件的批判。即使是江青对我示意和当面讲了刘少奇王光美的许多坏话（见下文），我都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江青的话，更没有拿江青的话去揭发批判刘少奇；即使是在中共九大会议上，那么多人发言揭发批判刘少奇，我也没有把江青说给我的关于刘少奇的那么多坏话透露过一句。

我赞成打倒刘少奇，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可是，过分的迷信，个人崇拜，就使我走上了唯心的道路，走向错误的极端。1967年7月间，北京高校的造反派在中南海外面安营扎寨，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到造反派中间接受批斗，北大组织学生参加了“揪刘火线”，我还亲自到中南海外面去看望了参加“揪刘火线”的学生，以表示鼓励，在“揪刘火线”事件中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但是，这年夏天，我对毛主席的有些做法，也开始产生看法了。信任还是信任，但是一些具体问题上，不那么虔诚了。不那么说一不二了。这是后话。

◇ 江青请我吃饭

毛主席接见完以后，就在十一中全会上，江青在一次小组会上，说她要请我到她家里去吃饭，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但我也不能拒绝。我以为是她和毛主席请我去呢。会议结束以后，我就跟她坐她的车子走。没有想到，她是把我接到了钓鱼台，而不是中南海。那时候她住在钓鱼台。中央文革的成员当时都住在那里。

吃饭的时候，江青对我说，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很尖锐。过去，毛主席的指示谁也不听，刘少奇把阶级斗争都搞到她家里来了。刘少奇怎么派人安窃听器，怎么派服务员监视她和毛主席的行动，在家里她和主席都不能随便谈话，把阶级斗争都搞到她们家里了。她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也发表不了，她要写东西，要改编剧本，搞样板戏，等等，也处处受到限制。她说刘少奇和王光美夫妇二人生活多么奢侈浪费，房子要住最好的而且要比她和毛主席都多；出国访问的时候那么铺张，穿得那么漂亮，衣服换了又换。她自己呢，生活俭朴，衣服也很少，身上一点儿钱都不装。江青攻击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因为那是在8月初，是3号还是4号，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还没有拿出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写于8月初，是写在《北京日报》的头版空白处的，然后压了一天，8月5日，由毛泽东的秘书誊正，

作为会议文件下发给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代表——笔者)。江青对我讲这些话，显然是有用意的。至于她的自我标榜，当时我就想，你还要装什么钱，你想要什么东西还用得着你花钱去买吗？她说，我们写的那张大字报，是她自己亲自送给毛主席看的，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住在杭州，她自己去送大字报，非常危险，还有人跟踪，是刘少奇派的人。她还说，你很快就会知道关于刘少奇的一些问题。她还说，以后我有什么事情，就可以直接给她打电话，或者让李讷转告她，她随时可以接见我，等等。

江青这样讲，意图是很明显的。她觉得大字报是她亲自送的，我就应该对她感激涕零。而且，她还特意表示对我的关照，要把我拉到她这一条线上。她请我吃饭，是在8月3日或者4日，毛主席向刘少奇发难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则是在8月5日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公布的。说是“大字报”，其实是印成文件的形式，发给与会者的。江青提前向我透露有关情况，很明显地，是向我表示近乎，是“恩宠有加”，是表明她把我当作了她的嫡系和心腹，才对我透露最高机密。可是，我对她讲的这些事情都没有明确说什么，也没有对她表示感谢，更没有“受宠若惊”。我只是说，首长和我谈话谈得时间很长了，应该休息了。我就告辞了。我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

关于她请我吃饭，和我谈话的事，回校后，我只对孙蓬一讲过，没有对其他任何人说起过。因为我并不认为她请我吃饭就是一种光荣，对她讲刘少奇、王光美的那些坏话，我也不认为是确实的。就是在那时，批判刘少奇的高潮中，我也没有向别人透露过江青说刘少奇王光美的那些坏话。

◇ 不理睬江青，听王任重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即将结束的时候，王任重把我和彭小蒙（北京大学附中的红卫兵负责人）接到钓鱼台他住的地方。当时，王任重从武汉调到北京来工作，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他也住在钓鱼台，占了一座楼。他叫吕乃和专为我安排一个房间，要我在这里休息几天，并且说抽时间他和我研究一下北大的运动怎么搞法。他还让我以后在这里多住住，休息休息，有时间就过来。

我和彭小蒙分别住在王任重楼下安排的房间里，不住在一起，她什么时候走的我不清楚，王任重都和她谈了些什么，我也没有参加。王任重给我讲了那一番话，我听了很高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我就想，北大工作组走了，运动怎么搞？虽然领导没有交给我来负什么责，但是这时北大校文革正在筹备之中，我是负责人。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我自己也要遇到许多新问题，该向谁请示呢？正好，王任重也要抓住我，他找我，也是想通过我关注北大的运动。王任重说，中央文革关于大专院校的运动由他来负责，北大运动中一些大的事情，他来找我。

这正合我的心愿。因为那时候王任重正是非常受毛主席器重的，毛主席说，在各省的省委书记里头，王任重是既年轻又能干的，毛主席很欣赏他。我愿意找这样的人谈学校的问题，请示他。我决不会找江青。因为我对江青的印象不佳。我认为江青在党内一件实事都没有做过，既没有做过具体的事情，又没有做过领导工作。她在上海的时候是个电影演员，后来跟毛主席结婚，虽然长了一些政治上的见识，可是，她没有从事过实际的工作，只是以毛主席夫人的身份，生活得非常优越，我信不着她。还有，她在延安的情况，我当时就知道一些，对她也没有多少好感。我对于江青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对于她的阴险和无赖，是后来认识到的。“文革”初期，她一下子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在理智上，我只以为，她在毛主席身边多年，可能把过去的毛病都改正了，所以主席才叫她出来工作；但是，在感情上，我对她还是保持距离的。因此，江青和王任重都对我表示过对我的重视，我宁愿找王任重而不找江青。

接下来，是王任重具体指示我，北大要成立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在此之前，毛主席就让我参加组织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但是没有细谈。因此，北大校文革成立过程中的每一步，我都是请示过王任重的。比如，筹备校文革的人选时，打算让邓朴方当校文革委员的事，就是和王任重共同商量的，我在全校的群众大会上就此事做过动员，并且亲自和邓朴方谈过这件事（因为群众不同意，没有能够把邓朴方选上来）。有的事情，我直接找了王任重，有的事情，我是通过他的秘书长吕乃和找他。后来，王任重干脆把刘道玉派到北大来，名义叫工作组组长。像校文革要采取巴黎公社式的群众选举，就是王任重指示，刘道玉具体帮助我执行的。

这时已经是8月下旬，毛主席接见了全国红卫兵，大中学生开始全国大串连的时候。但北大已在进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不让学生出去串连。但学生看到全国红卫兵都在串连，要求让他们外出串连。王任重为此还进行过多次指示，我们也请示过陶铸。到后来，校文革选举刚刚结束，学生们就迫不急待地都跑出去搞串连了。

◇ 找王任重而不遇

我对王任重很信任，因此，不仅是关于北大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我经常请示他，就是别的事情，我也想听一听他的意见。

1966年9月那一次，我跟康生讲了安子文和邓觉先的事情以后，已经是深夜了。我心里觉得不踏实，就去找也是住在钓鱼台里面的王任重，想跟他也谈一谈这件事。我从康生那里出来，就去找王任重，吕乃和告诉我说，王任重不在家。我说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对王任重讲。吕乃和说，那你就等一会儿吧。他给我安排了一间房，我就在房子里等。等到半夜，打电话给吕乃和，说王任重还没有回来。我就在那里睡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吕乃和对我是特别冷淡。态度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我问吕乃和，王任重回来没有，他说是不知道，他还没有上楼去看。他对我的态度这么不好，我就没有必要再在这里等了。我在王任重这里吃过早饭，就回北大了。过去我到王任重这里，如果没有吃过饭，就在他那里吃饭。这次也是如此。我对吕乃和讲，等王任重回来，给我打个电话，我再来找他汇报工作。就告辞了。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见过王任重。后来才知道，王任重出事了。吕乃和对我的态度改变，就是因为王任重出事。我和王任重在工作中，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他没有理由冷淡我。过去，每个星期都是好几次联系，现在却失去了联系，我一再打电话找他，总是说不在。王任重出问题，是后来才知道的。王任重被抛出来之后，北大的一些群众组织提出来，“炮轰王任重，火烧聂元梓”，借机会想把我搞垮，这成为我与王任重的关系的余波。

不但是北大反对我的人，拿我与王任重的联系做文章，江青也想借这个问题搞我。我不理睬江青，遇到事情向王任重请示，江青当然不会满意。后来，王任重倒台以后，江青就想整我，说我和王任重有密切的关系，和王任重打得火热，要我揭发交待问题。我就是不揭发交待。我说，我没有什么可以揭发王任重的。后来，江青一定要我们写揭发材料，不写就过不了关。我就和孙蓬一商量，应该写些什么，不写些什么，我们就避重就轻，讲了些最简单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要找王任重请示工作，找也找不到。找到他了，他说话也是说了不算数，比如关于学生串连的事情，他指示不让学生外出，后来又改口说可以分期分批地去等等。我们始终没有讲过王任重的什么实质性问题。

◇ “大民主”选出的校文革主任

工作组在北大搞了一个多月，毛主席一声令下，工作组统统撤走。

在工作组撤走之前，江青和陈伯达几次到北大来，辩论工作组的问题，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7月28日，北京大学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我被选举为筹备委员会主任。要筹备成立校文革，王任重指示，要采取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方法。要从基层，从群众中间选出校文革。8月30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召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选举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常委和正副主任。王任重参加了大会的开幕式。此后，到9月11日，北大召开的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我被选举为校文革的主任，领导全校的文化大革命。

第十一章 不知道如何领导运动的“领导”

◇ 保护北大的文物、档案

北大经过“巴黎公社式”的群众选举，我被推选为校文革主任。可是，专职领导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我，却不知道如何领导这项“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对于文革怎么搞，一开始，我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却完全不合时宜。

直到现在，我也是这么看，平时群众和领导隔得那么远，群众有什么意见，领导根本不去过问，群众想批评领导也够不着，想提意见也到不了领导耳朵里，许多领导就是高高在上，瞎指挥，工作搞不好，还批评下级，批评群众。所以，运动一开始，各个单位、各个部门的群众给领导贴大字报，其中确实有不少很有水平的意见，很有分量的批评，各级领导真是应该好好地听一听群众的呼声，认真地接受群众的批评，改进各单位的工作，解决存在的问题，改进干部身上的缺点错误。但是，运动到这里并没有刹车，没有告一段落，而是继续“揭老底”，“揪黑手”，到后来就乱了套，变成互相攻击了，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出来了。彼此之间有意见，有矛盾，就我贴你的大字报，你贴我的大字报，互相攻击，还有闹派性，从互相贴大字报发展到互相动手，搞武斗，这叫什么事儿！

说实在的，我这个校文革主任，对于“文化大革命”究竟应该怎么进行，也是一点儿都不知道的。就是看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和自己的一些经验处理问题。比如，当时在各个学校和社会上，都兴起过“破四旧”的浪潮，到处乱砸乱破坏。北师大的学生从北京跑到山东曲阜去，砸孔庙孔林。我呢，认准了一条，国家的文物和财产，谁也不能破坏。我向全校师生群众讲话，号召大家保护文物和国家财产。北大的师生素质高，辨别力强，热爱北大，运动初期，在保护学校的文物档案上意见比较一致，不但自己不去破坏，还积极地制止外来的红卫兵的乱砸乱冲。因此，北大的文物，像华表啊，乌龟驮石碑啊，图书资料（主要是图书馆的全体人员保护的，聂注），还有学校的档案（主要是校文革组织组派人保护的，聂注），我们都坚决进行保护。不但是学校里的学生不能乱动，外边来的红卫兵到北大来破“四旧”，也被我们阻止了。当然，我一个人哪有那么大的力量，我是动员起北大的干部、教师和学生来，一起进行保护。校文革的第一副主任孙蓬一就曾经出面带领学生保护北大西门的石狮子不被砸烂。有一次，中学的红卫兵到北大来，要砸这砸那，我就在高音喇叭里大声疾呼，要大家都去劝阻外来的中学生，都去保护学校的文物，马上就有很多人应声而出。在“文革”中，北大在这些方面是保护得最好的。有个“文革”中间毕业的学生就曾经对我说过，北大的图书馆在运动中也没有受到损失，一应资料俱全，他毕业离校办手续的时候，因为丢失了从图书馆借的书籍，还赔了钱呢。

还有一件事情。“文革”中那么混乱，中宣部把它的全国司局级以上有问题的干部档案，足有一两百人的档案，都转移到了北大，交给我们负责保护，我们也都保护住了这批干部档案，主要是“除隐患战斗队”赵建文保管的，一点儿也没有受到损坏，没有泄露出去。这都是事实啊。

那时候，别的学校已经都出去串连了，我们整天宣传不要去串连，或者到车站去动员学生回来，要在学校里进行自下而上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当时王任重对串连的态度是分期分批，这一批出去回来了，下一批再走。实际情况是，串联一开始，学生们就在学校呆不住了，都要出去串连。我也没有办法，就再次向王任重讲，要他拿主意。王任重笑我，你也太沉不住气了。那你请示陶铸吧。我就给陶铸写了一个报告，请示他，学生都要离校大串连，应该怎么办？陶铸的态度不是很明确。他不能表态反对大串连，大串连是毛主席同意的，毛主席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天安门上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连的红卫兵吗？他也不能表态同意。学生出去要是一表态，学校还不呼拉一下子走空了？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还怎么搞下去？

我还给陈毅副总理写过一封信。我想请他来北大做一个形势报告，讲一讲国内外形势。我想，他要是能来北大做报告，我在学校就有话讲了，陈毅同志要到北大来做重要报告，同学们都不要离开学校，都要参加听报告，就好把学生留在校园里了。陈毅副总理开始同意了，是口头讲的，我就正式地打一个报告给他，安排有关事宜。后来他写了一封信来，用毛笔写的，说是他最近工作很忙，不能到北大来做报告，要等过一段时间再说。哪里知道，很快地，文革的火就烧到陈毅身上了，说陈毅同志也有问题了。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来北大。陈毅给我的信，就一直在我家里放着，迟群、谢静宜抄家把这封信抄走了。

◇ 毛主席说，北大是“池深王八多”

“文革”中的怪事多，其中之一就是在攻击诋毁他人的语言上有许多“发明创造”。

北大那时候出了一幅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这是讲北大的“牛鬼蛇神”多。过去总是说北京大学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有很多国内外知名的专家教授。现在是把褒贬臧否都颠倒过来了。这对联不知道怎么传到毛主席耳朵里去了，毛主席说，要改一个字，“池深王八多”。

毛主席是对李讷讲的，李讷当面告诉我的。池浅也好，池深也好，这都是针对着教授们讲的。毛主席这样讲了，我怎么办？出来进去的，碰到这些教授，我该说什么？原先我在经济系，一个教授一个教授地到家里去看望，现在我见了他们怎么办？特别是范某某，经济系的教授，是一向响应党的号召，是非常积极的，他也跟着小红卫兵起来“闹革命”，他老是追着我屁股后面，追到我家里去，问我这问我那的，要我告诉他该怎么“革命”。我跟他讲，你别找我，你走吧。他不理解我，他觉得我过去对他那么尊重，老上他家里去，关心他，连他姑娘闹离婚，跟另外一个男的怎么怎么好，他都对我讲，怎么叫她的丈夫发现了：她给那个男的写信，用的是一张软纸，纸张太薄，字迹都落到下面垫着的纸上，让他丈夫抓住把柄，闹得不可开交，等等。这样的家庭纠纷他都对我讲，让我帮他出主意，现在我怎么就不愿意理睬他呢？其实，我能对他说什么？我说你别跟着学生们乱斗？我不能说。我说谁谁谁是牛鬼蛇神，谁谁谁是反动学术权威，你应该去斗争他？我也不能说。在校园里，见了以前认识的老教授，我都是一句话不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要是别的学校的人，你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我可能会相信，北大的这些教授，我都了解的，我都到他们家里去过，谈过话，对他们很了解，我怎么能说他们是反动的？真是不好办。我就是没有学会周总理的那种本领，前头派人去抓你，然后把你请到家里，给你谈心。我要是会这个就好了。包括陆平在内，我要是在斗争大会结束以后，再找他谈一谈，要他忍耐住，以后等待平反，就好了。我没有这种灵活性啊。

我也没有办法放陆平出来。关起陆平来，是工作组搞的，工作队撤离学校，一项一项地跟我们交接，只有关押陆平的事没有交待给我们。工作组走了，学生们没有人领导了，就找我，在路上碰到了，就跟我说这些事情应该怎么办。我也不能说别的。工作组把陆平搞起来，是请示了上级的，工作组走了，我也不好放啊。我怎么放啊？

那时候学生也跟我说，陆平抽烟，他爱人给他送烟，烟里面偷偷地夹纸条。我没有吭声。夹就夹吧，夫妻两口人见不上面，写个纸条子还不行？陆平被关起来，他的家也从原先住的地方搬出来，我还到他新搬的家去看过他的爱人孩子，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表明我的态度。

可是，在更多的场合，那时候的我变成另外一个人了。那些老教授，本来都很熟悉，过去对他们很关心，现在见了面，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关心的话不能说，“原则”的话，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话说不出口，只好绷着脸，一言不发。

就是有一个机会，我马上抓住了。毛主席说，要保护好几个重点的学术权威，包括翦伯赞、周培源，等等，这下好了，我们就派了保卫人员，派了学生，轮流在他家里值班，翦伯赞在校外住，要是不派人看着，让别人揪走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派人保护他，谁也不准乱斗，谁要是斗争他，必须经过校文革批准。周培源也是这样。再就是给他们提供生活上的方便，他们几个人看病要车，随时要随时派车，翦伯赞的老婆这时候就特别感动，特别感激毛主席，说是毛主席照顾他们，现在不批斗翦伯赞了，生活也自由了，要车也很方便。这都是我亲自安排的，车队也是我亲自打电话安排的，要保证他们几个老教授用车。正是这样几个教授的生活刚刚得到改善的时候，工、军宣队来了。接管了校文革的工作，他们又来斗翦伯赞，其用意据说就要“解放”翦伯赞了，再斗一斗他，让他多接受点教训。这哪里是对待一位著名学者，分明是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翦伯赞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天又变了，快晴的天气忽然又起风暴了，认为是大祸临头，老两口一块儿自杀了。

我在台上的时候，学生乱斗老师和干部，只是斗一顿就拉倒了。因为他们既不代表校文革，也不代表哪一个领导，就是学生自己，他们也采取不了什么组织措施。工、军宣队来了，搞专案组，又是毛主席派来的，这是不是政策又变了？翦伯赞怎么能搞得清楚这些事情？

校文革这一段，没有逼死任何人。程贤策自杀，是工作组还在学校的时候，他自己害怕，跑到香山自杀了（按：据有关资料，北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是在被中文系学生斗争批判后，于1966年9月2日服毒自杀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以后，先后自杀死了24个人。这是68年8月工、军宣队进校以后，到“九大”以前，全校隔离审查，就是这几个月，死了24个。我去参加“九大”的时候，我已经是在被隔离状态，总理和江青找我去谈话，孙蓬一和别的人跟我讲，你去见总理，你可别光说你自己的事情，你要说说北大的情况，已经死了24个人了。我跟总理讲了北大死了24人的情况，总理说别着急，很快会派人去的。可是，还是迟群、谢静宜在北大，是他们领导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啊。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丁凯文（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